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对峙美政府至今,哈佛还能“撑”多久

■郭英剑

自今年5月中旬起,美国哈佛大学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冲突突然升级,引发全球高度关注,焦点集中在国际学生政策、学术自由以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前景上。特朗普政府决定撤销哈佛的学生与交流访问者项目(SEVP)认证,禁止其在2025—2026学年招收新的国际学生,使得这所著名学府顿时陷入困境,众多国际学生处于恐慌之中。

这场源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冲突不仅对哈佛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打乱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很多人都在跟踪媒体的报道,也有很多人在不断叩问——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中,哈佛能否取得胜利?

哈佛的持久能力最终取决于司法结果、战略联盟及其在不妥协核心价值下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能过于乐观。

两强相争的最新进展

自今年初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将近3个月内,美国多所顶尖高校相继在联邦政府的施压下低头,即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世界名校也未能幸免。但4月14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公开宣布拒绝政府要求,成为高教界集体喝彩的“反抗日”。此后,美国联邦政府持续施加压力,双方斗争不断升级,媒体与网络舆论持续聚焦,哈佛乃至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界都被推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权力博弈风暴中。

特别是在5月22日,双方的斗争达到了高潮。

当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撤销哈佛的SEVP认证,禁止其招收新的国际学生,并否定目前哈佛校内6793名国际学生的身份合法性。美国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称哈佛的国际项目接纳了来自“非友好”国家的学生,并受到外国资金的影响。哈佛则迅速于5月23日提起诉讼,指控该禁令违反宪法和联邦法律。

5月2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联邦法官发布临时限制令,暂停撤销SEVP认证,允许哈佛暂时继续招收国际学生。5月28日,特朗普政府的立场略微软化,给予哈佛30天时间提交证明其SEVP认证合理性的证据,包括国际学生和项目的详细记录。法院则在5月29日的听证会上延长了临时限制令,维持现状直至最终裁决。

然而,联邦政府在5月26日加大施压,特朗普总统威胁削减哈佛3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并将其重新分配给职业学校,除非哈佛提交外国学生的数据。网络平台上的网友发帖则放大了这一言论,一些用户支持撤销联邦合同和资金,认为哈佛理应受到惩罚。同时,哈佛大学领导层则毫不退让,公开批评政府的策略,凸显大学的坚定立场。

截至目前,双方的争端尚未解决,哈佛在临时限制令下继续运作。5月29日,哈佛第374届毕业典礼成为了象征性战场,加伯在演讲中嘲讽政府政策,赢得了现场所有人的起立鼓掌,体现了校园高度一致的团结对抗精神。

然而,法院最终裁决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持续的财政和监管压力,使得双方的争斗结果仍不明朗。

国际学生政策压力对哈佛的影响

不可否认,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给哈佛带来了学术、财务和声誉上的重大挑战。国际学生占哈佛学生总数的近31%,是其多样性、科研产出和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支柱。若SEVP认证被撤销,数千名国际学生的合法身份将受到威胁,并可能在72小时内被驱逐或被迫转学到其他院校。这种不确定性在学生中引发广泛焦虑。

在财务上的影响尤为严重。国际学生通常支付全额学费,对哈佛每年55亿美元的运营预算贡献巨大。失去新国际学生可能导致其每年收入减少数亿美元,加上联邦资金潜在削减的30亿美元,损失更是不可估量。

在声誉方面,哈佛作为全球学术领导者的地位无疑也会受到严重威胁。禁令削弱了其吸引顶尖国际人才的能力,而这是哈佛声望的基石。哈佛的法律抗争虽然展现了其对学术自由的承诺,但也引发了两极化的反应。在网络平台上,一些评论支持哈佛的抗争,另一些则反对其对抗政府的行为。这种两极化可能侵蚀公众的支持和捐助者的信心,尤其会失去保守派校友的支持。

在运营层面上,哈佛面临后勤困境。转移或遣返数千名学生需要前所未有的行政努力,并会扰乱学术项目和研究。哈佛的诉讼和公关活动虽然必要,但在客观上分散了核心教育任务的资源。

综合来看,称哈佛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毫不为过。该校正在法律防御、学生福祉和机构生存之间寻求平衡。

校长校友日演讲:哈佛的乐观与不屈精神

美国当地时间6月6日,哈佛大学举办了校友日活动,加伯在集会上的演讲再次成为这场争端的又一重要节点。

加伯以哈佛388年的历史为背景,指出其核心在于“审视、进步与革新”。他强调,哈佛并非完美,但其对真理的追求永无止境,这一理念使其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能够屹立不倒。他提到,哈佛正通过三方面努力来应对挑战:一是反驳对大学的歪曲;二是抵御政府因哈佛拒绝放弃权利而施加的报复;三是回应合理的批评。这三点清晰勾勒出哈佛的战略——既要捍卫学术自由,又要正视自身问题,如反犹太主义等,以维护校园的包容与安全。

在演讲中,加伯并未直接提及特朗普,但其言辞明显针对美国政府对国际学生的打压和对研究资金的削减。他引用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位女士的话:“未来人们将回顾这一时刻,记得当原则受到考验时,哈佛没有屈服。”这一引述不仅强化了哈佛的道德立场,也唤起了校友的集体认同感。活动现场近6000名校友的热烈反应——包括三次起立鼓掌和“加伯”呼声,表明哈佛社区在这一斗争中的团结。

在演讲中,加伯还表达了对哈佛前景的乐观态度,认为学校坚持追求真理(Veritas)的传统将引领其渡过难关。加伯的乐观态度源于对哈佛社区的信心。他提到,自己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无直接关联人士的支持,如阿肯色州的僧侣、肯塔基州的图书馆人员等。这显示哈佛的抗争已超越校园,激发了广泛共鸣。这种支持为哈佛提供了道义和资源上的后盾,使其有能力继续对抗政府压力。

与此同时,加伯也坦承目前面对的挑战巨大,未来之路不易,并呼吁校友持续支持哈佛践行大学的使命。

可以说,加伯的这一演讲不仅重申了哈佛对抗特朗普政府的决心,也为大学社区注入了信心,展现了其在危机中的领导力与韧性。

必须指出的是,就在演讲的前一天,哈佛获得第二份保护国际学生地位的法院命令,暂时缓解了SEVP认证撤销的危机。加伯的讲话无疑巩固了这一胜利的象征意义,同时为哈佛的长期斗争定下了基调。他不仅重申了哈佛对学术自由和多样性的承诺,也通过乐观的展望激励社区,强调哈佛的持久力来源于学生、校友、教职员及支持者。

然而,该演讲也反映了哈佛面临的复杂平衡。加伯承认反犹太主义是校园问题,并提到已采取措施。这显示哈佛在对抗外部压力的同时,也在进行内部调整,以应对政府和公众的批评。这种内外兼顾的策略表明,哈佛的“不屈”并非盲目对抗,而是结合原则与务实的综合应对。

总的来说,加伯的校友日演讲是一次有力的动员,其乐观与不屈的姿态激励了社区,同时也提醒人们,哈佛的抗争不仅是保卫自身,更是捍卫高等教育的普遍价值。未来,哈佛的持久力将取决于其能否在法律、公众支持和内部改革中找到平衡,而加伯的演讲无疑为这一征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哈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

虽然说哈佛还在努力抗争中,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在回响——在这场与美国联邦政府的抗争中,哈佛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如果不能,它还能坚持多久?

事实上,“哈佛还能坚持多久”已经成为这场争端的核心问题。

必须承认,哈佛与特朗普政府的对抗,看似旗鼓相当,实则力量悬殊。联邦政府掌握签证发放、移民执法和安全调查等直接权力,一纸行政命令便能令数千名国际学生暂停入学;它还能通过财政拨款、科研经费和税收政策,对所有公立与私立高校形成隐性压力。

相比之下,哈佛虽拥有百余亿美元的捐赠基金、法学专家团队和全球声望,却无法单方面恢复政府授权或者改变联邦法规,它的每一次诉讼胜利都需承担巨大的法律成本和声誉风险。

更重要的是,哈佛的生存依赖于学生注册数量、捐赠者信心和校友支持,一旦国际生人数大幅锐减,其财务平衡与学术多元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哈佛能以法律程序拖延时间或缓解冲击,却始终无法撼动政府的终极决定权,而这正为“哈佛还能坚持多久”埋下不容忽视的现实顾虑。

就目前来看,哈佛的法律策略尚且有效,临时限制令也为其争取了时间。哈佛主张SEVP认证的撤销违反了正当程序并超出行政权限,这一立场得到法官的支持。然而,政府的提交证据要求和将禁令扩展到其他大学的威胁,表明其心意已决。如果法院最终支持政府,哈佛可能面临国际学生群体的灾难性损失,并迫使其重新评估全球模式。

公众和政治支持也将影响哈佛的持久力。毕业典礼上的对抗和对政府错误的公开嘲笑激励了校园社区,但也疏远了一些保守派利益相关者。网络平台上的发帖显示了公众情绪的分裂,一些人赞扬哈佛的立场,另一些人则期待其失败。持续对抗需要哈佛在这种两极化中保持与其他高校的联盟。

当然,失去数千名学生的风险巨大——除了直接的财务损失,长期的全球声誉和研究能力的侵蚀可能是不可逆的。虽然哈佛的历史韧性表明其能承受长期冲突,但这一挑战的规模考验着它的极限。

可以说,哈佛的持久能力最终取决于司法结果、战略联盟及其在不妥协核心价值下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能过于乐观。

高等教育的悄然变革

在我看来,这场备受瞩目的冲突中,美国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更广泛的变革。哈佛在4月底已经将该校的DEI(多元化、公平性与包容性)办公室更名,实际上是像其他很多高校一样,撤销了该计划及其相应的政策。这些变化反映了高校在政治压力下的战略调整,揭示了大学角色在两极化社会中的深层张力。

同时,这种变革也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大学角色的重新配置。历史上,大学在智力自主和公共责任之间保持平衡,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要求大学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目标更紧密对齐。网络平台上提到的审查国际学生和课程的措施,表明有意将高等教育重塑为文化和政治的工具,而非开放探究的堡垒。

从现实变化看,高校撤销DEI可能会减少大学的文化多样性,抑制批判性话语。然而,这些适应也展示了其韧性——高校在动荡环境中努力保留核心功能。可以说,高等教育的悄然变革已经揭示了原则与实用主义的张力,哈佛大学正是站在了定义学术自由未来的战斗前沿。

当然,哈佛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斗争不仅是一场政策争端,更是美国高等教育灵魂的较量。虽然哈佛的法律胜利和基金会为其对抗提供了支撑,但其持续性仍不确定。数千名国际学生的潜在损失对哈佛的韧性和战略智慧构成重大考验。

总之,哈佛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它的选择不仅将塑造自身的未来,也将影响全美高校的轨迹,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向。未来,哈佛能否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斗争中获胜,尚需拭目以待。

学派建设需要避免“学术近亲繁殖”

■王晓凡 庾美娟

5月20日,《中国科学报》刊发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包万平的文章《高校学科建设要具有“学派意识”》,引发了一定的关注。同时,也有人质疑高校里搞“学派”是否会导致学术上的“近亲繁殖”。

“学术近亲繁殖”是与学派建设、学科发展相关联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笔者想从大学研究的质量与公平角度出发,对其“利”“弊”进行评判。

需警惕,但不能因噎废食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学术近亲繁殖”。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沃尔特·伊尔斯和奥斯汀·克利夫兰便对“学术近亲繁殖”进行了解释,即学校选择在本校获得一个或多个学位的学生作为其教员的做法。但在笔者看来,“学术近亲繁殖”的范围不仅限于学术聘任,还应扩大到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等多个环节。它是一种以私人关系亲疏,而非以个人能力高低为依据进行资源分配,进而攫取更大私人利益的行为。

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何种现象,我们才能认为是“学术近亲繁殖”?一方面,能力不达标的人通过权钱交易进入研究领域;另一方面,资源匮乏但听话顺从、缺乏独立探索意识者与急于发展壮大的“大佬”之间彼此需要,并成为排除异己的“门派中人”。例如,在某些高校,多代学者、师徒扎堆形成的大团队,容易对利益相关者大开招生、培养、就业的方便之门。

在科学研究领域,“学术近亲繁殖”无疑是有一定危害性的。比如,在某些学术团队,“大佬”拥有学术上的绝对权威,以及重大资源与利益分配的权力。在这种依附关系与传统的师徒文化的影响下,团队成员的独立思维往往会受到约束,不同学术风格学者间的科研思维方式差异被磨平。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术近亲繁殖”会导致一些人背靠“山头”躺赢,妨碍营造公平而有质量的育人环境。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警惕“学术近亲繁殖”的危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学派对大学、学科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深远影响。

必须看到,学派在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能会聚若干一流水平的学术领袖或带头人,吸纳一批充满活力的学者群体,塑造共同的研究范式或思想主张,打造一个又一个“名师出高徒”的神话。这其中的“高徒”是学派的优秀传承者,具备“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与革新魄力。比如,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约翰·斯特拉特的徒子徒孙中,便产生了228位诺贝尔奖得主。

加强中国学派建设应多点发力

基于上述认识,为了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最大程度提升中国学派的代际传承力、思想观点引领力、知识体系标识力、思想对话建设力,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突破。

首先,积极营造开放、包容、协作、创新的科研环境。科研环境是与研究者成长、学派建设、学科发展息息相关的基本条件,其开放与包容意味着允许多种学术观点的存在、交流与碰撞;协作与创新则意味着不同研究者和研究团队愿意基于相同志趣,合作进行创新研究。一个健康、积极的科研环境能帮助研究者抛开对学术KPI的盲目追求,不拘泥于寻找“好乘凉的大树”,而是回归科研本质,将精力投身于真正有意义的研究中,进而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健全科学、灵活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是人才队伍建设的指挥棒,形式化的学术评价是“学术大牛”享有绝对权威、高校“青椒”难以开展独立科研的根本原因。改变凭能力、凭成果不如有“靠山”的科研成才观,克服唯学历、唯“帽子”、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实绩、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减少大学在招生、人才培养、聘任环节出现“近亲繁殖”现象,鼓励各级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厚积薄发。

再次,确保聘任与人才培养各环节公开、透明。公开与透明是实现法治的基石。唯有程序公开透明,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寻租,减少“学术近亲繁殖”的发生。坚持程序正当原则,于私能保障科研人员与学生的个人权利,于公能最大程度确保优秀人才进入科研领域,加快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

因此,在聘任、招生、学历学位授予等事关学生、科研人员利益的环节,大学应信息公开、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利益相关者有机会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意见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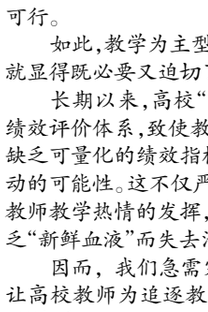
最后,完善科研诚信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惩处力度。推进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大学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针对学术不端行为明确专门机构、配备专门力量;加强师生科研诚信教育,建立健全“学术近亲繁殖”的事前预警、事中溯源、事后追责制度,扣好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第一粒扣子”,在招聘引进、职称评审等环节严格考察教师的科研诚信行为。

总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坚决惩治学术不端行为及学术腐败,完善师生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教育培训机制”,要求提高依法治教与科研管理水平。面向未来,大学应始终兼顾质量与公平,警惕学派异化为闭关自守的“门派”,跳出“学术近亲繁殖”的怪圈,发挥中国学派建设对大学学科建设的引领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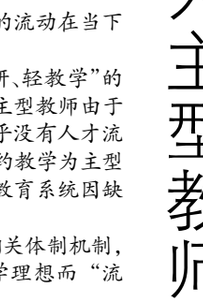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中国大学评论

吸引优秀教学为主型教师,『张榜引才』是个好方式



樊秀娣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耿宏伟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当前,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高校纷纷以高等教育转型为契机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然而,与各种新举措推出时的隆重场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一线教师对此却显得“淡然”。在很多人看来,无论教改项目的立意及蓝图多么“夺人眼球”,终究要靠人来“落地见效”。

客观上,当下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内涵式升级,迫切需要能全权负责学科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和保障培养质量等的高水平教学为主型人才。这类人才的专业才能大多源自于丰富的教学和学生管理经验,以及对教育规律的深刻洞察,这需要长期的积淀才能获得。显然,此类人才难以直接从新教师招聘中获得,要想得到他们,高层次教师人才引进的方式最可行。

如此,教学为主型教师的流动在当下就显得既必要又迫切了。

长期以来,高校“重科研、轻教学”的绩效评价体系,致使教学为主型教师由于缺乏可量化的绩效指标,几乎没有人才流动的可能性。这不仅严重制约教学为主型教师教学热情的发挥,也使教育系统因缺乏“新鲜血液”而失去活力。

因而,我们急需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让高校教师为追逐教育教学理想而“流动”起来。

事实上,教学为主型人才的流动要比科研为主型人才来得更加容易。这是因为以科研为目的流动所需关注的科研目标更具不确定性、科研成果更具不可控性,对科研内容和过程的监管则更不具备可能性。但高校对教学为主型人才的引进,往往从开始时就有一个较明确的工作方向及具体任务。

鉴于教学为主型教师流动具有“具体性”和“即时性”的特点,采取“张榜引才”模式能较好满足需求。

“张榜引才”作为一种以目标为导向、以任务为核心、以成效为检验的人才延揽和管理机制,为高校引进高层次教学为主型教师人才提供了一种明确需求、快速响应的模式。其操作重点在于——高校决策者首先需研判学校发展规划和学科专业建设的实际需求,明确界定特定教学岗位的目标、要求、职责、任职资格、预期成果和考评标准等要素,以此形成对教学为主型人才的“需求榜单”并公开发布,吸引具备相应条件的优秀人才“揭榜”竞聘。学校再根据相关规则进行遴选,最终确定引进人选。

不同于高校对科研为主型人才引进一般采取“引进人才在先、预期成果在后”模式,“张榜引才”模式为“先有预期目的,后有人才引进”模式。本质上,前者通过物色有资质的人才得到预期成果,后者更注重在现有目的下对人才的物色。由此,在采用“张榜引才”模式时要充分体现其特色。

一要目标更明确。“张榜引才”的本质是以需求为目标的“筑巢引凤”。高校要明确每个引进人才岗位的具体目标要求、考核标准,以及配套支持和保障措施,这样才能确保引进人才的后续表现与学校实际需求高度契合,避免人力资源错配。从这个角度看,“张榜引才”对高校管理者了解基层教学实际情况提出了很高要求。

二要权责更清晰。引人高校需要对教师流动中相关主体的责权利作出明确界定或说明,这既是对学校自身责任的压实,也是对有流动意向教师的职业发展负责。总之,明晰各方主体的责权利能帮助有流动意向的教师根据校方要求和自身情况,作出是否“揭榜”竞聘的选择。在教学为主型教师仍不受重视的当下,此举将激发相关教师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努力实现教育理想,也能让那些只想“混名利”的人知难而退,因为他们经不起“动真格的”考核。

三要评价更科学。对教学为主型教师的评价要打破“科研指标”的束缚,不再以论文、项目等科研记录为重点,而是要直面实际效果的“真功夫”。比如,不少国外大学在聘任“教学教授”,或设立特定教学改革项目负责人时,会发布详细的职位描述和预期贡献,强调候选人在课程开发、教学创新及学生辅导方面的实践能力和成功经验。国内也须综合运用试讲、教学方案设计与答辩、教学成果展示、同行推荐以及学生匿名评价等方式,全面考察教学为主型教师的能力和贡献。

四要监管更到位。教育教学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和闪失,引进的教学为主型教师一般承担重要的岗位职责,因此,对其工作投入和成效的监管,除了要严格按照合同规定做好各阶段考评外,还要建立常态化的过程监管机制,进行动态跟踪和绩效评估。教育教学工作具有个性化、生成性的特点,同时也是一个“良心活儿”。高校管理者平时还可以到课堂听课,多与师生交流相关教改问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不仅能有效了解教师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也能很好地发挥保障教育教学监管质量的现实意义。

(本文系上海市2024年度决策咨询研究教育政策专项课题“上海高校教师有序良性流动模式研究”阶段成果)